

论当代中国的新大众史学

王 锐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062)

摘 要: 伴随着当代中国与世界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在大众文化领域出现了以青年人为主要群体的新的历史表现形式与历史观。它既体现出对晚近以来世界形势变迁的新认识, 又体现着对中华文明与现代中国革命历程的尊重与敬意, 并透露出更为全面的全球视野。当然, 在当前消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 加上新媒体自身表现出来的特征, 这样的新大众史学还有许多需要完善、成熟、深化的地方。而能否将这一新的文化感觉及其实践基础上升成为学术话语, 为历史研究注入新鲜空气, 让专业者产出更接地气、更近现实、更为大众的内容, 建立起当代中国的新历史叙事, 需要学术界的普遍参与和深入思考。

关键词: 当代中国; 新大众史学; 新媒体; 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 K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19 (2021) 05-0181-09

众所周知, 在现代国家, 如果想要让绝大多数国民形成比较稳固、合理、自洽的政治与文化认同, 必须注意到大众历史观的重要作用。当前中国文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根据新的时势, 在深厚而扎实的知识积累之上, 构建符合基本历史演进脉络, 能够让当代中国人认识今天的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能够从更广袤的背景来分析当前中国与世界基本形势的基本特征, 能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凝聚政治与文化认同、增强全民族的政治判断力以及文化素养的长时段的历史叙事与整体历史观。这既是注重历史经验、强调实践的这一中国文化基本特征在当代的具体体现, 又是新的中外形势下让中国树立起自洽、牢固的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解决好, 那么未来发展中将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阻力, 避免一些涣散人心、让社会文化陷入紊乱的因素再次出现。反之,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好的方案与成果, 那么, 不但无助于各级决策部门更好地完成基本任务, 还会滋生出制造社会对立、破坏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因素。因此, 对于这个问题, 不但需要知识界人士重视历史研究、历史教育与历史普及, 更需要相关从

收稿日期: 2021-07-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明等级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影响与批判研究”(20CZ046)

作者简介: 王锐,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业者具备成熟的政治视野、敏锐的政治意识和深厚的政治德性。

在一份关于当代青年的调查报告中,研究者发现:“被访者也对中央政府、传统文化、革命传统以及国家的作用抱有非常正面的态度。69.8%的大学生表达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与之相对,仅有6.2%的大学生对中央政府缺乏足够信任。同时,90.3%的大学生认为应该弘扬传统文化,78.1%的大学生认为应该弘扬革命传统,71.3%的大学生认为遵循政府的政策对国家的发展很重要,82.5%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繁荣会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①正如这些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在今天,只要稍微关注各类新媒体上的大众思潮,大多数人都会感觉到青年人(一部分“85后”、大部分“90后”)对于中国与世界的许多问题的看法与之前年龄段的群体有着不小的差别。其中,青年一代在新媒体上表达的对于中外历史的看法尤其具有代表性,形成了一种新大众史学。对此笔者曾在其他文章中有简要的描述性分析,总结了这一新历史观的几个基本特点,比如更为全面地认识现代国家成长史中的必要条件、关注到欧洲各国、美国、日本之外的世界各国的发展史、抱着理解与善意的态度去认识20世纪中国革命、对近代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体现出较为支持与同情的立场。^②总之,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包括大众史学在内的各种知识与信息的传播与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学校与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在此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此外,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大众史学背后往往体现的是一定的政治观与社会价值观,新历史观必然是伴随着政治与社会的新变化而生。如果让青年一代还处于某种“自为状态”的新历史观能够不断地完善、深化、普及,那么就必须正视当代青年普遍感受到的社会状况。而要想实现这样的愿景,就必须考察新大众史学是在怎样的媒介渠道与传播机制中流行起来的,其之所以流行的原因何在;在与怎样的文化形态作对比中,新大众史学这种“新”体现了对于历史与现实怎样的基本态度;在今天的信息传播渠道上,新大众史学表现出来的值得人们进一步反思与探讨的地方;如何以一种比较良性的方式使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重视这一新大众史学,进而根据新的时势创造出更为完整而自洽的通史类著作与历史普及著作。^③

一、新大众史学的传播形态与表现方式

历史在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社会文化层面,它不仅是出于丰富知识的原因而对过往之事进行追述,更是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不同代际的人们表达对时代观感与认识的重要凭借。历史知识的表现形式、传播渠道、受众群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背后往往反映出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大众文化氛围。要想全面把握新大众史学的传播形态与表现方式,有必要回顾当代中

① “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研究”课题组:《当代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报告》,《文化纵横》2019年第6期。

② 王锐:《走向“政治成熟”的契机——新媒介与当代中国青年新历史观的形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

③ 坦率地说,属于体制内的学院内部通过翻译、介绍西方世界关于“公众史学”的论著,不断召开只限于体制内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编写各类基本只限于体制内现役学者与预备役学者的小圈子阅读的教材。这固然有知识层面与学术积累层面的意义,但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很难真正通过了解当代中国新的思潮动态来思考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知识与历史阅读问题。也正因为如此,笔者撰写此文,不是为了在当前已经颇成势力的公众史学研究领域插上一脚,而是想进一步思考那些已经出现并且具有一定新形态的文化现象。因此,本文不采用“公众史学”这一学院式的名词,而是效仿当年影响着许多革命青年,回应了真实社会现状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大众史学”来称呼这些新的文化现象。

国大众史学的总体流变。

（一）新大众史学的传播形态

近3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作为文化内容之一的历史知识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社会上进行传播。在互联网兴起之前，一些带有商业色彩的图书与杂志是广大民众接受文化知识的重要媒介。不少具有一定文史训练的群体在这些平台上发表、出版各种关于中外历史的文章与书籍，并在书店里售卖。此类出版品中对中外历史的描述与评价，很大程度上形塑着当时处于青年或中年阶段群体的基本历史观。当然，这种历史观基本上与后冷战时代全球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话语高度贴近，意在凸显一种“历史终结论”式的历史视野与政治诉求。在今天的大众文化语境里，这类出版品多被称为“地摊文学”或“地摊历史学”，一方面体现出青年一代对这些出版品背后观点颇不认同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它广泛的传播力。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互联网兴起，大众历史知识的传播也呈现出新的形态。在各种以文史与时政话题为主的论坛（BBS）里，有许多关于历史问题的文章。一些影响力颇广的博客（Blog），也常以历史为话题发表各种讨论。从创作群体来看，这些互联网时代的历史类文章多出自具有一定文史训练、拥有高学历的群体之手。基本的受众群体，也以广义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与先前的图书、杂志相比，互联网在信息的获取上具有更广的范围，拓展了使用者对于中国与世界的了解范围。并且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思想界的几次重要论争，如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与革命、民族主义与“接轨论”，开始通过互联网下沉至知识分子群体之中。^①在互联网上发表各种对历史问题看法的人，经常受到这些思想论争的影响，进而以此为问题意识，去回溯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其结果就是，先前具有广泛笼罩力的历史观开始受到进一步的质疑与否定，开启了在大众文化领域构建新的历史观与政治观的契机。从影响上看，它为2008年中国网络思潮里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进入21世纪，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越来越受到重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一个拥有广泛共识与号召力的口号。它不仅与主流意识形态贴合，而且在具体利益与价值导向层面，能够获得许多以文史研究为业的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海外华人的认同。在此背景下，“百家讲坛”这样的电视节目开始兴起，它主要通过邀请大学专业教师，用较为通俗的方式面向大众讲授带有一定话题性与吸引力的历史文化知识。依靠中央电视台的影响力，以及相关媒体和出版机构的宣传，这一节目在2010年前后影响颇广，一些高校教师通过这个平台成为了老少皆知的公众人物。由此衍生出各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话题来吸引观众的问答类电视节目。当然，这样的“传统”形象主要是古代的诗词曲赋、传统典籍中的“为人之道”，以及古代王朝的兴亡更替。

（二）新大众史学的表现方式

从这些背景出发，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新大众史学“新”在何处，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何。首

^① 这里的“知识分子”，主要指的是至少具有大学学历、大专学历的群体，以及从事文化与教育工作的高中毕业生群体。

先，现在大部分长期活跃于新媒体，或者通过新媒体来了解包括历史知识在内的各种信息的群体，主要是“85后”“90后”“00后”，以及一部分对过去的各类文化产品抱有批评态度的“85前”。这些群体之所以会对中外历史有各种新的看法，主要由于他们都大致感到这30余年来中国与世界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且之前流行的大众意识形态非但难以有效解释这种变化，反而成为了新的教条。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升，称得上是思考当代各类问题的主要前提，如果否定这一点，那么便不具备最基本的实事求是精神。与之相应的是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所宣扬的“历史终结论”并未出现，那种把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本质化、单一化，进而不断宣扬它们如何繁荣、如何进步，政治与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具有普世性，在最近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变局面前，越来越难以说服他人。特别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与2020年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让愿意真正实事求是开眼看世界的人们不断地感觉到西方内部面临各种危机，其体制与文化具有许多难以克服的症结。而对于未来人类的发展而言，过去在中国大众文化里不断被复制的各种关于西方国家的“神话”，其实未必能对人类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反而更有“撒向人间都是怨”的可能性。

在此背景下，这批人开始以更为自信的眼光去审视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不再将其视为落后的、愚昧的、必须被替代的“黄土文明”，而是着眼于认识其中的核心根柢与实践方式，尤其是其波澜壮阔的政治史与军事史，而非仅从一种充斥着东方学色彩的论述方式出发去“观赏”民俗层面的、静态的中华文明。同时，他们也能更为全面地去看待西方文明的发展史，祛除之前文化传播中建构起来的亘古不变的“优秀”西方文明形象。特别是注意到了西方国家开始影响全球历史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而在漫长的古代情形却并非如此。这就与之前“百家讲坛”式的传统文化论说有着本质的区别。

其次，既然在现代社会里，历史知识与国家认同关系紧密，那么，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其实是建立在两个重要基础之上，一是新中国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旧中国因孱弱而屡遭列强欺凌的境地，奠定了中华文明再焕新生的基本契机；二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紧密依靠广大群众，通过人民战争的形式，重组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使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大众实现了名副其实的翻身与解放，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正因为具备这两个基础，新中国才具有极为深厚的立国根基。就此而言，从救亡图存与阶级翻身的角度叙述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形塑当代中国国家认同的重要环节。

但是，不同于19世纪欧洲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紧密结合，曾经在文化领域颇有市场的中国式自由主义其实难以促进青年一代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它的兴起是在特定时期伴随着对西方的想象与倾慕，以及对中国传统与中国革命的污名化，因此当新一代中国青年开始感受到国家发展的成就，需要更为全面地观察与思考中外历史，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比较强烈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感时，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基本无力提供相应的思想资源与历史素材。只能与各种解构主义结合，声称现代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没有一个连续不断的中华文明、近代中国寻求富强与反对压迫的民族主义思潮是由“官方”刻意“发明”出来的。

更有甚者，晚近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新自由主义一直强调政府应从经济领域退出、停止各种

旨在保护一般平民的福利政策、在较大范围内实现经济自由化，这样可以克服发展瓶颈，实现经济增长。但从英国到美国、从东欧到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虽然增长了，但同时金融资本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国内的分配问题愈发严重，最富有的一部分人占据了国内财富，中下层民众面临更加严峻的民生问题，自然资源在“去管制”的发展模式下遭受到严重破坏。这让身处其中的青年一代有了深切的体会。因此，他们有颇为强烈的主动性去寻找近代历史当中那些真正改变了中国面貌的要素。

新媒介下的新大众史学，很大程度上填补、充实、激活、升华了历史内容。比如，在点击率极高的知识问答平台“知乎”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就中国而言，近代到今最伟大的人是谁？”几乎99%的回答都是毛泽东。许多网友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还叙述了自己对毛泽东认识转变的历程，比如青年时受到当时众所周知的思潮与文化产品的影响，开始对他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随着年纪渐长，尝试真正独立（而非把受某类思潮与文化产品的熏染视为“独立”）地思考中国与世界问题，同时真正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才感觉到他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认为他的思想学说堪称当代中国最宝贵的遗产之一。许多篇幅较长的回答，内容非常感人，在评论区中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强烈共鸣。这背后显现出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历史意识。

又如，在广受青年人关注的视频网站 Bilibili（B 站）中，有不少点击率极高、收到许多好评的关于中国革命史与国际共运史的视频。它们用视频的方式介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强调革命的曲折与艰难；用电子地图的方式重现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战役，让人们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有代表性的是，不少青年网友制作了许多与抗美援朝战争相关的视频，其中包含了对近代世界演进逻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所处地缘政治格局的扼要分析，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人们为什么这场战争堪称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为什么“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尤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新大众史学既是对20世纪90年代“地摊史学”的反思与批判，又继承了互联网时代方兴未艾的政治与文化思潮。

二、新大众史学的生产方式及其限度

从文化生产方式的角度看来，在所谓“公众史学”的话语里，虽然许多能够形塑历史记忆与历史观的空间、场所、建筑、文本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但是有资格去排列、叙述、定义、评价这些的群体依然主要由专业化的历史学从业者组成，然后“自上而下”地去进行相关操作，并未太关注随着中国与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出现的大众新思潮。虽然“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相关历史知识的准确性，但在这样的知识传播结构里，所谓“公众史学”的主要参与者——公众，某种程度是缺席的。更有甚者，如果说历史意识是一定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反映，那么那些有资格来排列、叙述、定义、评价各类公众史学载体的人，他们自身的历史意识，往往也是来源于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深受熏染的大众文化思潮与全球主导意识形态，把这些特定的价值当成可以定义何谓“好的”公众史学的重要标准。在此背景下，由专业人士所定义的“好的”公众史学，基本的受众群体大概率也是那些与之受到相似大众文化思潮与全球主导意识形态影响的群体。而其

他不受这些影响的、人数同样十分广泛的“公众”，往往是不在场甚至被一定程度污名化的。例如，东南沿海建于半殖民地时代的西洋建筑与旨在呈现“现代城市文明”的博物馆往往能够成为“公众史学”的重点讨论与正面评价对象，而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上海的龙华烈士陵园却难以有相同的待遇。

（一）新大众史学的生产方式

当前日渐兴起的新大众史学，在生产方式上体现出明显的广度。其兴起，主要依靠微信、视频网站（如B站）与知识问答平台（如知乎）。在表现形式上，它或是从一个与现实高度相关的具体的历史事件出发，展开丰富的讨论与内容呈现；或是由大众思潮中引起普遍关注的历史问题入手，通过带有辩论色彩的文字或视频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是针对当前中外热点话题，借助讲历史的方式提供给大众一个认识与思考这些问题的视野。不同于传统的电视节目与纸质版报刊，在大数据时代，新媒体的传播速度与影响力非常迅速和广泛，可以在短时间内汇聚大量的人参与其中。以此为载体来传播的历史知识与历史叙事，其影响力不是传统的历史知识传播渠道与媒介所能比肩的。这体现出青年一代有着比较强烈的表达自己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看法的诉求。特别是各种新的表达方式，如课程类短视频、视频说书、剪辑影像资料、知识问答平台的帖子，甚至是包含着一定历史意识的弹幕、留言，都有助于传播各种历史知识，呈现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视野与历史观。许多视频节目，比如对中外现代史的分析与对历史上真正能够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内容的介绍，其点击量动辄上万，甚至十几万；一些引起普遍共鸣的知识问答平台的帖子，比如对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论述、对19世纪以降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分析，往往有成百上千的回复量。总之，较之“百家讲坛”这样的由体制内专业学者主讲的电视节目，这类新媒体中的历史内容制作速度更快，更能贴近当下的大众思潮，更能与观看者产生互动，因此比前者更吸引青年一代的关注。较之一些历史类专业微信公众号，这些内容不是面向特定的学科小圈子，以推送知名学者的文章、讲座、日常活动、著述目录为主，它体现出的是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对于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新看法，表达的目的是为了展露心声，而非通过不断推送本专业的相关信息来强调学科的内部等级秩序与权力话语结构。

在内容上，新大众史学参与者重新激活了那些被他们认为的真正影响现代中国历史进程、让中国摆脱艰难境地、使大多数中国人面貌焕然一新的历史内容，并用新的表现形式将其呈现出来，使之更具活力与感染力，其内在的精神更能引起青年一代的共鸣。这一点，从最近几年一些视频网站与知识问答平台里对于抗美援朝战争史的叙述、分析、评价里能看出来。论其影响，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倒退十几年，大概没什么人会想到那首旨在表现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气概的歌曲《英雄赞歌》，会在主要是年轻人浏览的视频网站上有着总共几十万的播放量。又如，在知识问答平台上，一个已有1000多万浏览量，名曰“红军几乎是苦行僧的生活，为何旧社会群众还会自发参加？”的帖子里，其回复或是用各种历史资料，或是转述家里长辈的回忆，或是叙述相关历史背景，来正面地解释这个问题，呈现出对于中国革命战争年代里人民战争、群众路线、根据地建设、“党指挥枪”的高度认同。

另外,过去 20 余年里大众文化传播当中被视为正面历史符号的内容,在新大众史学的视野里,也呈现出更多长期被人忽视的面相。比如对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大众文化传播领域长期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瑰宝。但新历史知识与历史观的视域下,人们会关注到这些文化人群体是生活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在这一历史背景里,同时期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样的。并且会站在一个更为全面的角度去重新评估那些被赋予大量光环的文化人的真实水准,以及反思他们为什么会被各种各样的历史叙事拔高。此外,这一新大众史学同样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西方历史形象,特别是内部的冲突、杀戮的历史,近代以来不断对外扩张、殖民的历史,以及在这些过程中用来进行自我合法性论证的意识形态的真实内容。而这些历史内容,恰恰也是过去的大众文化传播领域有意或无意予以忽视的。

(二) 新大众史学的限度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前的新大众史学其实也体现出一些限度。首先,这些知识与信息大多借由新媒体来进行传播。但在目前的媒体格局下,新媒体易受消费主义的影响,由消费主义及其衍生品主导的文化产品在新媒体更容易进行传播,并且由于其背后资本的力量,这些文化产品往往有着更多话语霸权。在此情形下,略为专业且严肃地讨论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文章与视频,在前者强大的辐射力之下很容易被边缘化。因此,如何保证这一新大众史学具有持续的传播力,这其实是一个颇为严峻的问题。

与之相关的,现在参与新大众史学传播的群体,主要是在校学生或刚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尽管这样能够使具有一定借由了解社会来思考历史的契机,但是一旦面临毕业求职与毕业后进职场工作的问题,在市场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游戏里博弈的过程中,他们还有多少时间与精力来参与这样的文化传播工作,其实是一个未知数。对后者而言,随着年龄渐长,会面临越来越重的工作与生活负担,在此情形下,参与和新大众史学相关的活动的很可能大大缩减。就此而言,虽然新大众史学目前呈现出一种社会自发而生的状态,但体制内靠国家财政领取工资的历史研究者至少拥有一定的持续阅读与写作的条件,相比于他们,前者的阅读与写作(或曰“创作”)时间很不确定,对于参与新大众史学传播的群体持续而深入地思考历史问题颇为不利。

其次,新媒体固然有助于使传播范围越来越广泛,但带来的问题就是容易造成内容层面的知识愈发零散以及受众层面的碎片化阅读。如此一来,本来需要一定连贯性与完整性的历史知识变得十分零散,甚至流于所谓的“段子”,这样既不便于在浅显的知识之上展开深化与提高,也不利于从知识上与立场上去影响更多的人。更有甚者,如今的网络传播中流行所谓的“造梗”,这固然有助于加强对于某一块知识点的印象,引起一定的共鸣,比如在播放与国民党、蒋介石有关的视频时,弹幕上就常被“常凯申”“微操大师”等嘲讽蒋介石政治军事能力低下的弹幕刷屏。在此基础上,借由大量互动,网友间形成了一些与历史知识有关的“梗”,如借用电影《让子弹飞》中反复强调“公平”与“不许跪”的“张麻子”隐喻现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用该电影中横行一方的豪绅“黄四郎”隐喻现代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但这样的表达形式,

很容易造成本应以严肃态度对待的历史议题变得高度娱乐化、轻浮化，甚至会让一些人只是由于某种“梗”较为流行就盲目跟风，仿佛被灌入许多看似是知识却并非知识的文化泡沫，而没有对背后的历史与政治问题进行比较理性且深入的思考，甚至养成习惯后很难去进一步思考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对形成本着严肃态度与理性思考来分析历史与政治问题的风气实无助益，很容易被资本逻辑下的消费主义所裹挟，难以从整体上提升新大众史学的知识品质。

三、新大众史学如何成为新历史叙事的组成部分

分析当代的新大众史学，必须立足于思考如何建立当代中国的新历史叙事，并使之成为我们的文明叙事与政治叙事的根基。从理想的状态来说，这一新历史叙事的建立，既需要建立在学术界扎实而深入的专题研究基础之上，又需要对当前的时势有着充分的了解，能做到知古又知今，融学术研究与大众普及于一体。而从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看，如果说钱穆的《国史大纲》表现出在中国处于危机时刻应运而生的一套整体历史叙事的话，那么滋养钱穆基本历史观的，就是他早年接受的民族主义教育，特别是梁启超发表的一系列通过讲历史的方式来向国人宣传救亡图存必要性的文章。又如晚近30年来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历史叙事，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其具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但它之所以在当时流行，与其说是那一时期专业化史学内部精深研究的结果，不如说是表现了那一时期的文化氛围以及政治、社会与经济层面的各项实践。

（一）建立新大众史学与专业史学研究的沟通渠道

因此，为了构建新的历史叙事，必须重视在新媒体上兴起的新大众史学。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建立起一个能够沟通前者与专业史学研究之间的渠道。从专业史学研究而言，专业化固然有助于阅读更多的史料、通过发表机制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但一个好的历史作品离不开对于时势的敏锐洞察，尤其不能以专业化为借口，为自己越来越小圈子化、封闭化的研究开脱，并拒绝接纳一切非体制内历史研究的史学主张与史学实践。纵观人类史学发展史，专业化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人们读史写史更多是基于希望通过历史来汲取智慧，去理解过去、分析现在、展望未来。如果按照专业化的标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无学术前史，又缺少新材料，根本不能称之为史学研究著作，但这无碍于《罗马帝国衰亡史》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崇高地位。又如王夫之既没受过专业化史学训练，也没有运用些许出土文献，但无碍于他的《读通鉴论》当中透露出深刻的历史洞见。总之，体制内的历史学从业者应该努力走出特定的文化小圈子，不要沉迷于通过与现实中大多数人隔绝而彰显自己精英身份的“幻想”之中，尽可能地多接触社会，做到“以百姓心为心”，使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能够更为鲜活、更接地气、更具时代感。

（二）新大众史学应进一步学理化

新大众史学如果想获得更多的支持者、进一步实现自身所希冀的目标，那么就必须把内容不断地深化，把历史意识尽可能学理化，而非将主要议题停留在对先前大众文化形态的反思与批

判上面。回溯历史，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左翼知识分子撰写的各类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在社会上极为流行，范文澜、胡绳、翦伯赞、王亚南等人的著作成为广大知识青年了解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参考，吸引了许多人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之所以能有此效果，就是因为这些著作用历史的方式揭示了当时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特征，表达了广大民众对于时势的呼声。而今天许多体制内的文史从业者，虽然在专业化的培养方式之下术业有专攻，但其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深受晚近30余年的大众意识形态影响。某种程度上说，今天的不少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是在用较为学术的语言把那些大众意识形态进行再一次传播，甚至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处于“日用而不知”的状态，他们对于当前中国与世界正在发生的各种深刻变化缺乏敏锐度。因此，新大众史学的时代任务之一，就是将其透露出来的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敬意、能更为平等而多元地看待世界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国革命史与新中国建设史的温情与敬意等影响到更多的人，使之成为未来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中的基本价值观念。而要做到这一点，新大众史学对历史的研究就不能仅停留在浅尝辄止的状况，而须尽可能使这些感觉成为一种具有学理化、逻辑性、自洽性的思想意识。

最后，必须承认，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喜欢读历史了，“历史热”成为当前文化界的显著现象。在图书市场上，各类历史著作特别是通史类著作琳琅满目。但如果承认通史类著作本身就透露出一定的政治意识与文明意识的话，那么，当前西方汉学家编撰的通史、日本东洋史研究者撰写的通史、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通史在我国史学图书市场中大行其道，这本身或许就是一个颇为严峻的问题。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流行起来的日本东洋史研究者撰写的通史，其中的殖民主义、文明等级论、解构中国论如此明显，但却很少引起人们的反思。^①这显示出如何建立好的历史叙事、如何警惕各种别有所图的历史叙事，在当前已经成为迫切而严峻的问题。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窃以为亟须用新大众史学当中显现出来的正面特征来反哺相关领域，为历史研究与通史编撰注入一些新鲜空气，使之能写出更接地气、更引起大多数人共鸣的历史作品。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在通史研究中出现新的《国史大纲》、新的《中国通史简编》，在专题研究中出现像谭其骧、何炳棣、许倬云等前辈学者那样的视野与问题意识，写出的作品不但在专业内首屈一指，而且能给社会上关心历史问题的人们以启发。吐故纳新，去其陈腐，这是人类思想史与学术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②更是让现代中国实现天翻地覆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此而言，在今天不应忽视新媒体上出现的新大众史学。

责任编辑：董宇宇 刘金路

^① 刘小枫：《新史学、帝国兴衰与古典教育》，《拥彗先驱：走向政治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38—545页。

^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4页。